

吴组缃  
著

吴组缃  
小说课

吴组缃 著  
傅承洲 整理

吴组缃  
小说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组缃小说课/吴组缃著;傅承洲整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644-5

I. ①吴… II. ①吴… ②傅…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2609 号

责任编辑 徐文凯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任 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8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页 1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44-5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 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

——以遗作、讲义为中心(代序) .....	傅承洲 1
论《金瓶梅》 .....	1
《聊斋志异》讲稿 .....	25
一 绪言 .....	34
二 《聊斋志异》故事(题材)的来源 .....	47
三 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 .....	81
四 选读示例(《张鸿渐》) .....	115
五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与艺术描写 .....	135
谈《三国演义》 .....	164
谈《水浒》 .....	173
关于《西游记》 .....	186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	195
《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 .....	244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几点体会 .....	281

# 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

——以遗作、讲义为中心(代序)

傅承洲

吴组缃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他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名著的研究方面都发表过重要论文,尤其是《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等几篇论文,堪称学术经典,这些论文大多收进他的论文集《说稗集》和《中国小说研究论集》中。在《说稗集》出版不久,马振方便发表了《说〈说稗集〉》,首次对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成就作了评述,认为吴组缃从事古典小说研究有两个特别的条件:“一是很早就开始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擅长小说创作。两者对他的古典小说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构成《说稗集》的鲜明特色。”<sup>①</sup>1994年,吴组缃去世,周先慎撰写了《吴组缃先生的古典小说研究》,对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吴组缃“以一个小说作家特有的眼光、素养和经验,尤其以他对人生热忱而执着的态度,对人和社会生活的切身的

<sup>①</sup> 《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体察与认识,深广的人生阅历,以及对艺术敏锐的感受力,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上形成了鲜明独特的风格”<sup>①</sup>。200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纪念吴组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交了一批探讨吴组缃古代小说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比以前的研究又有细化和深化,程毅中的《论述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学术思想》以吴组缃的论文《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为基础,结合其他论文,对吴组缃的中国小说史思想作了归纳与展开。周先慎的《重温吴组缃先生论〈三国演义〉》和石昌渝的《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分别就吴组缃研究《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主要观点作了评述。刘勇强的《吴组缃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观照范围涵盖了吴组缃的现代文学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由此归纳出吴组缃文学研究的个性。<sup>②</sup>上述研究,对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的成就与风格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但这些论文基本上是以吴组缃生前发表的论文为立论依据的,事实上,吴组缃对古代小说的研究并不限于已发表的十几篇论文,他的学生马振方在《说〈说稗集〉》中指出:“吴先生在课堂上讲授过的对我国古典小说的许多精辟见解和心得体会还没有写进这个集子,将在新著中和读者见面。”<sup>③</sup>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吴组缃年事已高,这些“精辟见解”还没有写出来就与世长辞,除了当年听课的学生外,他人对这些研究并不知晓。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吴组缃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课程,先后主讲过宋元文学史、明清文学史的基础课和中国小说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专题课,并编写了

① 《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② 上述论文均收入《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讲义。这些讲义,只有宋元文学史,由沈天佑整理、增补,于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明清文学史本来也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因讲义大多遗失,未能整理出来。2011年,我在整理沈天佑师的文稿时,发现了一批吴组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讲义,这批讲义分别用活页纸和笔记本(只有一种笔记本装订完好,其他均为散页)撰写,部分讲义章节注明了撰写时间,还有一些讲义编了序号。根据讲义的用纸、编写时间和序号,大体上可以辨认有以下几种:

1. 1955年秋季讲授《红楼梦》专题课的讲义。
2. 1957年秋季讲授《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
3. 1960年秋季讲授明清文学史的部分讲义,存《明代文学概说》《〈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与艺术》和《儒林外史》三章。
4. 1961年春季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及1962年春季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补充讲义。这两种讲义写在一个笔记本上,1962年补写了《〈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三国演义〉的艺术描写》《〈聊斋志异〉选讲》三节。
5. 1961年秋季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存《明代拟话本》《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章。
6. 另有三张活页纸的《西游记》的讲义,没有注明课程名称和备课时间。

这些讲义,只有《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比较完整,其他课程的讲义多有遗失,比如明清文学史肯定要讲戏曲与诗文,现存讲义中未见相关内容。根据个人的授课经验,一门课,第一次讲,肯定要写详尽的讲义,以后再讲,可以用以前的讲义,只需作一些修改和补充,不一定重写。吴组缃的讲义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1961年春季的中国小说史讲义,就没有《儒林外史》和《红

《红楼梦》的内容,《聊斋志异》也比较简略,因为在此之前,他讲过《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专题课和明清文学史的基础课,完全有可能用以前的讲义。在这批讲义中,还夹有一篇研究《金瓶梅》的论文,用方格稿纸誊写,与讲义明显不同。这批讲义,多数章节已经整理成论文发表,笔者仔细对照过《红楼梦》专题课讲义与《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一文,虽然讲义列了十个专题,只有两个专题写得比较详尽,其他专题只有一些提纲,最详尽的一个专题《〈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贾宝玉的典型形象》与论文内容基本相同。也有论文写于讲义之前,如《〈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发表于1954年,至少是写于现存讲义之前。还有一些讲义没有整理成论文发表,最重要的要数《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论《金瓶梅》的论文很可能是根据讲义整理而成,生前没有发表。笔者谨对这些重要的手稿作简要介绍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对吴组缙的古代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成就作进一步的探讨。

## 二

《论〈金瓶梅〉》是吴组缙已经定稿没有发表的一篇文章,论文用16开对折600字红色方格稿纸誊写,誊清后又有修改,共26页,一万五千多字。稿纸下方印有“京电 65.11”字样,应为稿纸印刷单位的简称和印刷时间,“京电”是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的简称,吴组缙另一篇讲稿所用的400字稿纸,下方就印有“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刷 65.1”。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吴先生的这篇论文写于1965年底或1966年初,这就不难理解这篇论文定稿后没有发表的原因,因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术刊物不能发表研究《金瓶梅》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吴组缙首先论述了《金瓶梅》在章回小说发展



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两个第一:

《金瓶梅》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上是一桩应该重视的大事,因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会日常生活,描写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作品。

《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并不是吴组缃的发现,但吴组缃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作者的一种假设:“当时山东有不少通俗文艺作家,如散曲作家冯惟敏(1511?—1580?)、戏曲作家李开先(1501—1568)等,设想像冯惟敏这样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第二个第一,则是吴组缃的创见。此前,吴晗曾提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sup>①</sup>郑振铎认为:“她(指《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sup>②</sup>吴组缃明确指出了《金瓶梅》是第一部用家庭日常生活的题材揭露黑暗腐败的社会与政治的作品,无疑比前人抓得更加准确。论文紧接着用大量的篇幅对《金瓶梅》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吴组缃说:

《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叶后社会政治黑暗与腐败的书。从众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动的深入细致的描写刻画中,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转变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即有关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所

①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②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以停滞不进或发展迟缓的主要问题。从这个意义说,它是比《红楼梦》早一个半世纪、明中叶后当时的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绝不能仅把它看做一部“淫书”或“秽书”。

通过分析典型形象来探讨小说的思想意义,是吴组缙研究古代小说的常用方法。吴组缙认为,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怎样认识作者给我们塑造的西门庆这一个典型人物,是理解此书主题思想的要害问题。”论文对西门庆是这样定性的:“西门庆是个官僚、富商又兼地主的封建统治代表人物。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在许多地区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濒于腐朽没落,因而力图垂死挣扎时期的特种产物。”这种市侩“利用可能有的特权以及一切不法手段谋取眼前实利暴利”,“财富集中在这种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手里,绝对不会成为有利于发展经济裨益民生的生产性资本;恰恰相反,它只会助长他们所掌握的封建特权,更加疯狂地干坏事,破坏工农业生产,打击正当的商业经营。”这些财富,“最显眼的还是消耗在他们奢侈和糜烂的生活享用上面。”“在这个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下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境遇极为悲惨的被压迫者。”吴组缙用大量的明代史料与小说情节对照,在论述西门庆利用不法手段与特权谋取财富时,便引述了严世藩所列举的当时全国积货五十万的十七家富豪、积货一百万的五家富豪的名单,这二十二家,“除七家看来是商人,其他十五家都是王室、贵族、太监、大官和土司。”在论述西门庆的奢靡享乐时,引述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记载,“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某家请一客,“肴品计百余样”,又某家请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嚙。是日客有二十人,每客皆金台盘一付,是双螭虎大金杯,每付约有十五六两。”这些史料充分证明《金瓶梅》所描述的人物与情节是

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于是吴组缙得出结论：

全书暴露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面临变革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官僚、地主同市侩结为三位一体，形成极端腐朽反动的统治势力，紧紧压在城乡人民头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掠夺社会财富，吸尽人民膏血，摧残农、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从而穷奢极欲，腐蚀人心，严重桎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论文最后考察了作者创作《金瓶梅》的根本立场与态度。吴组缙认为：“书中的描写，在读者的眼前只见一片令人窒息的如磐夜气和森严的黑暗；虽然在被压迫层中也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抗，从侧面也透露了一点似有若无的斗争，但总的看来，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简直看不到任何与黑暗统治相对峙的积极因素和有希望的力量。”作者为什么这样处理？“原来作者暴露现实黑暗，并非从变革的要求出发，或向往什么新的前景，而只是要拿西门庆作个反面典型，对封建统治阶级提出警告。”从这篇论文所提出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来看，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原到它所写作的时代，无疑是“文革”以前少有的几篇精彩论文之一。

### 三

吴组缙生前曾多次讲授《聊斋志异》专题课，逝世之后，他的学生撰写纪念文章，好几位提到吴组缙当年讲《聊斋志异》的风采。北京大学中文系54级学生张慕羿在《难忘的专题课——纪念吴组缙先生》一文中专门回忆了吴组缙讲《聊斋志异》专题课的情境：

我们54级汉语文专业的同学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好点儿:系(中文)里开始设置专业专题课。专题课《文心雕龙》《红楼梦》《聊斋志异》《鲁迅》等都由校内外名家,如何其芳、吴组缙、陈涌等先生讲授,很受同学们欢迎,但我印象最为鲜明深刻的却是吴组缙教授开设的《聊斋志异》专题课。

他对《聊斋志异》版本考订之精当,对蒲松龄家世和交游考证之周详,对蒲松龄思想脉络分析之透彻,对《聊斋志异》思想艺术、历史地位评价之独具卓识,对国内外出版研究《聊斋志异》状况之熟悉,真是令人叫绝。<sup>①</sup>

笔者发现的吴组缙讲《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可以证实这些回忆所言不虚。讲义题为《〈聊斋志异〉讲稿》(下文简称《讲稿》),题后注明时间:“1957.9.25”,应该是首次备课时间。在讲义开头有一节关于课程的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向未讲过此课,对此课准备得也不够充分,谈不到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更不明白同学们的阅读情况,这就需要好好地计划与斟酌,并要求同学们随时的帮助。”说明这是吴组缙为第一次讲《聊斋志异》专题课所写的讲义,时间是1957年秋季。该讲义用活页纸正反两面书写,共29张,作者用红蜡笔按张标注了序号,实际共58页,每页39行,每行40多字,大约9万多字。最后一页明显没有结束,说明讲义后面可能有遗失。《讲稿》共有五部分:(一)绪言。(二)《聊斋志异》故事(题材)的来源。(三)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四)选读示例。(五)《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与艺术描写。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讲稿》中最精彩的内容——关于蒲松龄人生际遇与其思想和创作关系的论述,关于《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思想

<sup>①</sup> 张慕羿《难忘的专题课——纪念吴组缙先生》,《吴组缙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4页。

内涵与艺术创新的解读,作简要评述。

《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是这本讲义中最有理论深度的一章。在蒲松龄的生平研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胡适与路大荒。胡适在《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一文中<sup>①</sup>,根据蒲松龄的《降辰哭母》诗和《述刘氏行实》文考证出蒲松龄出生于康熙十三年,享年七十六岁,订正了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载“享年八十有六”的错误。路大荒广泛搜集蒲松龄的著作,编辑出版了《聊斋全集》,并编撰了《柳泉蒲先生年谱》<sup>②</sup>,对蒲松龄一生主要事迹与交游作了考述,对部分诗文作了编年。关于蒲松龄的思想的研究,学界起步较晚,在1957年以前,比较集中的话题是讨论蒲松龄是否具有民族思想,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是否具有人民性。吴组缃对前人研究蒲松龄的论著非常熟悉,关于蒲松龄的生卒年,《讲稿》采用了胡适的观点。对蒲松龄生平的叙述,也参考了路大荒的《柳泉蒲先生年谱》。对学界关于蒲松龄思想的讨论,吴组缃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赞成蒲松龄有民族思想的观点,他说:

这时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没有安顿下来,又加上如火如荼的民族矛盾,农民起义此仆彼起,反抗清朝刚建立的政权,而地主阶级却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甘愿做满清统治者的顺民,对农民起义加以血腥的镇压。所谓民族矛盾,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对于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和外族统治者,其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蒲家此时正是上升的地主,对农民的造反,更为仇视,更为敏感。决不会因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放弃与农民敌对的立场。

吴组缃肯定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思想具有人民性,“由

①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载路大荒、赵苕狂编《聊斋全集》卷首,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

于他的热衷功名,想往上爬,他的思想有极其庸俗的一面;由于他始终功名困顿,始终身处贫贱,一生过着冷淡生活,因此他的思想同时又有颇为光辉的一面。这光辉的一面,就是他的内心与人民百姓紧密连接在一起而产生的。”

前人已经注意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批判科举制度与其考科举的痛苦经历有关,但对此理解并不一致。何满子认为,“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残害下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理解得最为真切。他自己受过创伤,他所接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是被科举制度折磨得精神恍惚、如痴如狂的可怜的生物。”“他不是死抱住功名不舍的人,他虽然也按着那时代给知识分子安排好的道路去赶考应试,但碰了几次壁,认清了科举制度的底蕴以后,就意兴索然了。他中年以后的应试,与其说是贪恋功名,无宁说是为了习俗所羁,如他自己所说的‘犹守旧辙恋鸡肋’的食之无味之举而已。”<sup>①</sup>吴组缃不这么看,他认为“蒲则迫于客观处境,又自信具备主观条件,他是一心要往上爬,一生没有淡却猎取功名之念的。他大概每科必考,每考必以全力;虽然屡考屡败,但同时又屡败屡考,从没放弃热衷功名的念头。”吴组缃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证明蒲松龄始终热衷功名,并没有意兴索然。蒲松龄一面执着地参加科举考试,一面写小说批判科举制度,这该如何解释?任访秋认为,“蒲松龄的思想是非常庞杂的,不成体系的,因而中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矛盾。……由于自己科场失意,一生潦倒,故对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但在内心中,又不能忘情于功名富贵,因而对某些由此而位至显达的人,不禁又流露出艳羡之情。”<sup>②</sup>吴组缃也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和在作品中揭露科举的罪恶并不矛盾,

<sup>①</sup> 何满子《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第78页,第80页。

<sup>②</sup> 任访秋《〈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新建设》1954年第11期。

他没有否定科举制度,只是讽刺主持科举考试的人。“他之攻击个人——主考者的做法不对,办事的人岂有此理。他是为把科举制度弄糟了而感愤激,他不但没有对科举制度怀疑,反倒是站在维护和办好科举制度的立场上来作指责、发义愤的。蒲在作品中反复攻击科举,但所挖苦和嘲笑的,也只是主考官个人,认为他们没有眼睛,不识好文,不识真才,主观上只是发牢骚,也并没有攻击科举制度本身(但客观实际上是攻击了制度)。有人认为他一方面反对科举,一方面又以考中功名来报答所认为的好人,说这亦是他作品中思想矛盾,其实仔细研究,他的这种思想是统一的,并不矛盾。”应该说,吴组缃对蒲松龄思想与行为的把握更加准确。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描写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作品,学术界基本持肯定态度。分析这类小说产生的原因与意义,大多从时代背景的角度进行挖掘,封建婚姻制度剥夺了男女青年婚恋的权利,而蒲松龄热情赞美了这种反封建的爱情。吴组缃则独辟蹊径,从蒲松龄独特的人生经历来解释这类作品产生的直接原因。蒲松龄从三十一岁到七十岁,一直在外作幕宾和塾师,生活孤寂无聊。他的小说和诗文大多写于这一时期,其中爱情题材的作品寄托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吴组缃说:

蒲生活于达官缙绅的社会环境中,所能有的只是封建婚姻关系的夫妇之情。他之对于自由活泼的异性之美,对于志趣相同、彼此相知的爱情之乐,他亦是有所要求的。对于以才情自负而身处贫贱寂寞中的蒲氏来说,在他青年时代,此点恐怕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不能满足的。作品中对于爱情的体会,对多情青年男女的形象之描摹刻画,无不委婉动人,深切入微,正可证明此种情怀。

中外文学理论家早已指出,文学创作就是作家运用虚构和想

象来弥补人生的缺憾。吴组缃认为,青年蒲松龄大量创作爱情题材的作品,是其感情生活得不到满足所致。

《讲稿》对《聊斋志异》中的不少名篇作过精彩的分析,特别重视小说人物的创新意义。《张鸿渐》中的施舜华,吴组缃认为她是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非常欣赏她在感情面前大方、自信、真诚、直率的个性。舜华出场,“我们并不能知道她是狐仙,她是作为现实女子出场的。张在暗处微窥之,原来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美丽女子,她十分精明,一眼看到草荐,就盘问,老妪只好老实告诉出来,不敢隐瞒。这个年轻美貌女子立刻发脾气,与老妪刚才所料想顾虑的完全符合。发了脾气之后,见到了张,她却如此敬重风雅士,于是又责备老妪慢待了客人。立刻以酒浆和锦衾来招待这个落难的书生。张此时私问老妪,才补叙出来,原来太翁夫人俱早谢世,止遗三女,这是大姑娘。怪不得这初次出面,确是当家作主的大姊的气派。跟着即推扉而入,即榻上抚慰慌张失措的客人,说‘无须,无须’,并近榻坐,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虽有点腼腆,但多么大方、爽朗,开门见山,不似世俗女子的忸怩作态。张张皇地回说家中已有妻,她即笑着夸赞他的诚笃,十分自信,亦十分自负,不容对方再啰嗦,即干脆地说:‘既不嫌憎,明日当烦媒妁。’这完全是个思想意识获得解放的女子,在三百年前,完全是个未来的崭新的女性形象。”这种未来的崭新的女性形象,与封建婚姻制度是对立的。施舜华“听张说想念家中的妻子,即不高兴,说夫妇之情,‘自分于君为笃,君守此念彼,是相对绸缪者,皆妄也’。她要求的是真心专一的爱情,张的一番自以为言之成理的解释,实际是肯定封建社会多妻与重婚的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不成问题。而舜华笑着说的‘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实即反映了她的思想要求——即真心专一的爱情——是与封建婚姻制度(一夫多妻)不相容的。从这样的内心要求出发,她经过幻化试探,证实



了张的心之所属，即不能容忍。但其内心并不是没有斗争，其始还曲为解说以自慰，以为‘犹幸未忘恩义，差足自赎’。但对其恩义的感激，究不是她所要求的专一真心的爱情，所以过了二三日，便觉‘终无意味’，才决心送张回家去，成全他们。”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施舜华真诚专一的爱情理想，而且写出了—一个女性真实而丰富的人性。而吴组缃敏锐地发现并揭示出了这一形象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

吴组缃认为《霍女》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远远超过了《婴宁》，主要就是创造了霍女这一独特形象。他说：“《霍女》中写一富而吝的朱大兴，平日一毛不拔，吝啬无比，但性喜渔色，色所在，冗费不惜。霍女来找他，和他同居了二年，口求无厌，要吃最珍贵的东西，要穿要用最贵重的东西，还要常常嫌日子无味，要请戏子来唱戏。如此数年，朱供应不支，渐趋破产。此时霍女便不辞而别。她跑到邻村一个世胄何氏家，何是个大少爷，爱其美，十分宠爱她。朱知道了，与何氏打官司。最后霍女又到贫士黄生家，黄贫苦无偶，女救之，黄最初拒绝。霍女为之苦做苦干，操作家务，帮助他成家立业，以最大的真诚与心力贡献给他，与之过共苦共难的夫妇生活。她告诉黄说：‘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与邪者则诳之。’霍女是一种侠义式的人物，她完全突破了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最初像个荡妇，实际却如此地疾恶富贵，而倾心钟情于一个贫贱的书生。作者不因三易其夫而使其光彩动人的性格丝毫减色，这在当时社会中可谓大胆与难能可贵的创作。”吴组缃特别欣赏霍女破吝济贫的侠义品格和蔑视封建贞操观念的大胆行为，因为她突破了封建礼教和制度的藩篱，具有未来女性的性格特征。

吴组缃不同意将人物简单地分为好人和坏人，他说：

据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我个人以